

新書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二期（2021年春季）：394-402

DOI：10.6752/JCS.202104_(32).0015

尋找「群眾」？

Looking for the Masses?

林淑芬*

Shu-Fen LIN

2018年春天，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賀照田老師受邀至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講授「中國新時期興起的精神與思想意涵」，我因此有機會跟著課堂上幾十位學生一起旁聽了一學期的課。當時我之所以決定旁聽課程，主要是因為在第一堂課程介紹時，我就被賀老師對「過渡」與「群眾」問題的分析所吸引。由於我從博士論文階段開始的研究課題之一，就是檢視第三波民主化理論與公共論述對於臺灣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民主想像與實踐的影響，而從威權到民主轉型／過渡與民主鞏固的階段劃分所涉及的各种指標與意涵，即是其中的關鍵。此外，在賀老師來臺講學的前幾年，我陸續完成了幾篇梳理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與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分析生產模式「過渡」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理論發展，以及重新反省歷史唯物論與「政治主體」（群眾、無產階級、共產黨）的論文。這些理論性的探討，雖是長期閱讀當代歐洲基進政治思想所自然形成的系譜工作，但更重要的，毋寧仍是我對於歷史變革、政治主體問題與臺灣政治變遷的關注。我期待透過旁聽「中國新時期興起的精神與思想意涵」這門課，接觸認識當代中國問題的不同視角，並且能夠在歷史經驗、理論對話、研究方法與當代關懷等層次上與賀老師交流。

投稿日期：2021年1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2月17日。

* 林淑芬，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聯繫方式：propername@mail.nctu.edu.tw。

兩年前的課堂上，賀老師在其積累多年的深厚基礎上，以極其縝密的思路與語言，分析了在中國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過渡」時期對新時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但此影響與思想轉折，不論在當時或後來，都未能被充分認知、準確掌握。其中一部分的講課，構成了《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以下簡稱《革命—後革命》）一書的部分內容。在課堂之餘，除了私底下幾次的談話之外，我也跟賀老師及交大亞太辦公室的成員，一起組了讀書會，閱讀了吳永毅的《左工二流誌》。必須坦承的是，我不是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者，如果不是當時這些課堂與課外的交流，以及賀老師慷慨提供的其他文稿，我恐怕會因為《革命—後革命》所提出的問題、思考進路、書寫風格，以及流露於字裡行間濃厚的中國知識分子情懷，對我在知識上、思想上與情感上構成的諸多挑戰而打退堂鼓，無法參與此次的新書論壇。基於以上種種，在我不揣淺陋分享我對於《革命—後革命》這本書初步的閱讀心得之前，我要先向賀老師表達我的感謝。另外，我也要謝謝中研院歐美所王智明老師率先提供的發言稿，不僅提綱挈領地指出了本書的核心問題意識與重要貢獻，也補充了賀老師長期思想實踐的脈絡，而讓我得以直接進入我的提問。

《革命—後革命》全書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革命—後革命視域下的中國」，第二部分是「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本文以下討論僅聚焦第一部分所關注的「群眾路線」問題，文中雖有幾處引言出自本書第二部分，但未針對第二部分的問題意識展開討論。¹此外，儘管兩岸國家—社會相互牽連的歷史發展進程、其間的差異對照及針對當前情勢的反省極為重要，且本書第一部分討論作家陳映真的文學及思想的〈當革命遭遇危機〉一章的確也涉及了臺灣，且在我看來，這一反省在全書中占據了一個相當獨特的位置，但是，在這次的論壇中，我還是希望先請賀老師進一步闡述環繞在「群眾路線」上的一些問題。

1 對於此一議題感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考鈴木將久（2016）主編的《當中國深入世界——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本論文集收錄了九篇（包括〈前言〉）針對賀照田〈當中國深入世界〉一文的回應。

在《革命—後革命》第一部分的六篇文章中，作者試圖以其所謂「病藥相發」的歷史認識與分析方法，深入閱讀195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國初期的梁漱溟，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革落幕、「新時期」的黨國高層與「激進」知識分子，1980年代新啓蒙思潮代表人物李澤厚，在解嚴前夕臺灣關注「中國社會主義危機」的作家陳映真，以及1989年「六四」前後前衛藝術家方力均等思想家與創作者所發表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文學與藝術文本。作者深切期望跳脫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等主要思潮，針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歷史與當前處境的不同詮釋而引發的各種爭辯與感知框架，從而重新評估中國「革命」、「革命—後革命」與「後革命」經驗，打開思考當前中國社會各種問題的新視野。

作為歷史認識與分析方法的「病藥相發」所指為何？扼要地說，在作者看來，不論是「撥亂反正」（昨非今是）或「撥正反亂」（今非昨是），這兩種黨國高層與知識分子在「新時期」不同階段，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經驗看似截然對立的認識與診斷，形塑「新時期」的感覺結構、思想視野與發展走向。儘管兩者的規模和影響不盡相同，但都同樣無法做出正確的診斷，達致藥到病除之效，甚至都在未能根治舊疾的情況下，破壞了原先積累的某些良好的體質、而引發了新的問題。就此，本書第一部分不僅做了極為精彩、細膩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在洞悉「病藥相發」所引發的問題的同時，本書也提示了跳脫病藥相發循環的關鍵——群眾路線。

不論是對歷史與思想進行批判，或者批判的再批判，大抵都無法繞開認識上的真假與價值規範上的對錯，乃至批判本身的實踐意涵等問題。然而，《革命—後革命》一書最有貢獻，也最值得我們探討的面向之一，即是作者致力於以「從苦惱出發」的自我反身性，以及將「群眾路線」置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核心的觀點，讓本書所實踐的「省思」有可能以不複製多數批判知識分子難以跳脫的啓蒙真理與虛假意識的二元對立，但同時又能真正地貼近真實。也因此，本書第一部分六篇文章的作用，就不僅在於細緻地梳理「群眾路線」為何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被知識分子與政治菁英以不同的方式認知與重構，而毋寧更是在於評估這些認知與重構，究竟是有效地回

應、承擔與轉化了由群眾具體生活經驗所構成的社會現實，抑或是矮化了群眾、否定了現實。換言之，是對於群眾的具體生活經驗所構成的社會現實與表達的感知、對於此一社會現實無法被化約的多重決定特質的認識，並且在此感知與認識的基礎上，持續致力於調校自我，才提供了政治菁英，與包括作者在內的知識分子突破意識形態迴圈、貼近真實、切中與回應問題的可能。

此處，必須指出的是，在《革命—後革命》所檢視的不同歷史階段的眾多文本／實踐中，群眾路線不是被遺忘、摒棄，便是因為某些關鍵環節不到位而無法落實，以致徒留其名。顯然，不是任何一條標舉群眾的路線都可以成為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通向真實的不二法門。正是因為如此，《革命—後革命》才會反覆提醒：一旦群眾失去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條件，群眾不僅不再能被視為「現實」或理解「現實」的有效方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也就往往只能淪為當前許多批評者所指稱的「民粹主義」運動修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革命—後革命》一書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的精神與觀念結構的分析，便是對於在社會主義群眾路線遭到重構，乃至被遺忘之後，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同時作為社會現實以及通向社會現實的方法，其困難之所在的一種深切反省。以作者自己的話來說：

而當「群眾」所處身的政治、制度、權力環境，乃至言論、價值觀環境都發生巨變後，「群眾」則沒有條件再做原來的「群眾」。這時若共產黨還以原來習慣感覺與認知「群眾」的方式來運用群眾路線，便會由於這時的「群眾」通常不會、不敢、也沒有相應的氛圍與空間再以過去那樣直接乃至尖銳、直接的語言與行為呈現自己的真實想法，一些情況下相當部分「群眾」甚至會去主動迎合「群眾路線」運用者對「群眾」的期待。而這些「群眾」的新情況，當然就常常會使過去行之有效的「群眾路線」運用方式，不僅不必然成為推動共產黨切實有力深進實際、掌握實際，使它得以據之不斷發現自己認識、實踐不足，以不斷自我反省、改進的有效方法，反極容易成為妨害共產黨充分、準確認識現實的方法。（賀照田2020: 160）

上述這段引言分析的是1952年底，政治上已不存在可制衡或挑戰中共的政治或社會力量，而中共也已經通過一系列改革而得以鞏固自身、控制社會時的群眾狀態以及群眾路線的危機。透過這個略顯迂迴但仍相當有力的分析，我們應該可以理解，問題的關鍵，若要避免倒果為因，顯然不是群眾

變了，共產黨卻依然援用舊方法；而是如果群眾已然喪失了再做原來群眾的條件與功能，僅能成爲證成自身統治正當性的工具，以致共產黨對於現實產生錯誤的認識，制訂了錯誤的政策、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那麼，共產黨顯然是始作俑者，而不是群眾路線的受害者。然而，對作者而言，問題似乎又不盡然只在共產黨身上。

在〈從苦惱出發〉一章中，作者不無沉痛地指出，1970年代以來的中國，欠缺了一個「既具相當整理說明功能，又對共同體成員如何與國家、制度互動有相當指導功能，從而能相當程度調動共同體成員對國家、制度認同」的新的國家統合原理（*ibid.*: 340），加上其他各種經濟因素、政治事件與社會問題，導致了「中國大陸在不長的時間內便出現了隨處可見的嚴重的認同渙散問題」（*ibid.*: 341）。另外，在〈當前中國大陸的精神倫理困境〉中，作者則是嗟嘆「爲什麼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幾千年義利之辨傳統，近幾十年（毛澤東時代）更有高揚理想與信仰傳統的社會，在短短幾十年之內至少在語言層面已變成了一個以實利爲一切衡準的社會？這一過程是如何一步一步發生的？其歷史與觀念機制是什麼？」（*ibid.*: 287）

坦白說，雖然之前曾經讀過賀照田老師寫潘曉與雷鋒的文章，多少瞭解賀老師對於「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的診斷，但是對於前述的觀察與感受，卻仍然不容易產生共鳴。當然，最直接的原因仍舊是我對於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相當有限。不過，無可諱言地，也是因爲我對於「國家統合」、「認同渙散」、「數千年義利之辨傳統」等語彙背後的種種預設或訴求有所保留。無論如何，除了無法確認在深入文化、思想、精神史的同時，作者如何理解對抗性政治空間存在的重要性之外，我在閱讀此書時反覆浮現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既然把群眾路線帶回來，不僅是對於組織者與參與者的要求，也是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那麼，像本書作者這樣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意識到群眾已然失去自己解放自己的條件的情況下，要如何認真對待群眾而不預設群眾，才能不重蹈「比群眾更瞭解群眾」或者邊緣化群眾、否定自身所處社會的覆轍？

上述問題的重點，誠然不是期待本書提供我們辨識真假群眾的尺度，

畢竟這是本書作者極力想要避免採取的位置。提出上述問題的目的，毋寧是爲了指出，在對於現下的社會提出觀察跟分析的同時，特別是對於強調群眾的知識分子而言，在很多情況下，是否也仍然無可避免地得透過揀選某一「部分」的群眾，以之作爲對於「整體」社會病徵的診斷或出路？若然，則針對群眾路線所面臨或暴露的諸多困境的分析，要如何才能不致重蹈本書所批評的啓蒙思想的覆轍，或複製「病藥相發」的問題？

如果我們回到「群眾如何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關鍵問題上，在讀完本書對當前中國社會陳詞剴切的分析之後，我們還可以如何討論群眾自我解放的條件？在提醒我們早期共產革命群眾路線的經驗，乃至中國傳統倫理所表現的與「天地自然、良知相配合的社會構造原理」（*ibid.*: 283）、「中國傳統合作中通常會有的相互間的團契感」（*ibid.*: 285）之餘，賀照田老師對於「在改革中被集體釋放出的個體」（*ibid.*: 285）以及由這些個體所構成的新的社會型態，是否有任何除了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與虛無主義主導，理想主義潰不成軍之外，較爲正面、積極的評價？用一個比較抽象的方式來說，我的問題會是：如果我們沒有要那麼凸顯政治組織（黨）的作用，而是求諸社會自發變革的潛能，那麼，我們是否就必須在形塑主體的結構與權力關係中，看到的不僅是主體屈從、臣屬的一面，而同時也能發掘主體在新的結構與權力關係中所獲得的，可以用來突破結構宰制的新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如何從作爲社會性範疇的群眾中，發現其政治性？如此一來，我們是否就有可能一方面跳脫啓蒙的思考模式，另一方面既不只能在他方尋找群眾的身影，也不需要回歸與復興某些已然失落的文化傳統或精神，而是更專注於分析當下群眾的複雜構成，及其中所涵蘊的自我解放、突破結構桎梏的能力？

又或者，如果相對於社會自發的觀點，我們採取的是一個更強調政治自主性與組織必要性的立場，那麼「群眾路線」作爲綱領，「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作爲方法，要能不是服務某個特定、先決的政治理念，乃至僵化的意識形態，要能貼近而不脫離「群眾」，其前提似乎就在於透過制度設計，讓「群眾」成爲一個終極而言無法被任何權威挾持或占據的

「虛位」，以實現群眾持續的自我解放。如此，「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才能是一個持續開放、自我校正而非自我證成的政治過程；而所謂的解放，也不會只能寄望於（中國）人的某種良善品質的重振，或是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的清明覺知和自我要求，而是對於所有政治騎劫的抵制、對於任何專政都不再抱持任何懸念。

期待上述的討論，不會被視為是虛無飄渺的理論推斷，而無視於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遺產」，甚或是對於本書中針對關鍵歷史轉折的精彩分析，反其道而行之進行去歷史化的閱讀。相反地，恰恰是本書深刻的歷史分析，才讓這些問題可以作為經驗教訓被提出。再者，我也期待賀老師願意透過分享他在過去幾年觀察到的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具體範例，回應以上的問題。

在〈群眾路線的浮沉〉一文最後，賀老師透過雷鋒的群眾路線與謝覺哉的有關思考，提出了一個以「共和」為核心的理想圖像。扼要地說，在賀老師看來，群眾路線所著重的，不僅是經由群眾確認特定方案的正當性與可行性，更是在實踐過程中，養成參與者（群眾）的「共和意願」、「共和品德」與「共和能力」（*ibid.*: 163-164）。我認為這個關於「共和」的提示，相當具有啟發性。不過，即使不論中國自清末民初以來在「共和」問題上的歧見，「共和」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以及在當前中國的具體指涉為何，特別是「共和」與本書他處曾提及的「國家統合原理」或者傳統人與人之間的「團契精神」的關連為何，恐怕仍須請賀老師費心闡述。就西方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哲學中的共和主義而言，儘管環繞於共和主義的諸多爭議方興未艾，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相對鬆散地綜合古典與當代的共和主義思潮，大抵可以說共和主義關注的是政治自由與不受獨斷的權力宰制、公民德性、公民身分／權利，公民對於公共事務參與，權力分立，以及透過制度設計，確保公民監督、選擇不同層次的領導者或執政者的權利，以避免政治共同體腐化，或隨之而來的內部或外來獨斷權力的宰制及自由遭受剝奪等問題。

此處的目的，不在於繞道共和主義，進入「社會主義民主」與「西方民主」孰優孰劣的討論。事實上，除非我們仍然堅持一黨專政的必要性，

否則一味強調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差異，很多時候恐怕只是封閉了思考的契機。畢竟，所謂的「西方民主」，並不能被化約為一人一票的選舉或代議民主，乃至自由主義民主。在自由主義民主之外，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他各種基進民主的嘗試，而即使是在那些被視為代議或選舉民主行之有年的社會中，各種針對民主的意義、制度與實踐的爭議，乃至各種危機，以及對於危機的各種反思與克服的嘗試，從來也沒有少過。臺灣過去三十年的政治發展，亦不例外，我們沒有道理把臺灣或西方的民主簡化為選舉代議制度乃至其他形式由上而下的動員，而忽略了各種草根社會力量的萌生與發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持續調整。

回到共和的問題上。雖然我無法完全掌握賀老師所理解的「共和」，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對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之公民意識與能力的期待。倘若我們嘗試著從不願受宰制的積極公民的角度出發，設想「公民」不一定要被等同為原子化或以私利為優先考量的個人，也不必是選舉制度下的選民，以致在本質上與社會主義群眾路線中的群眾、階級或人民聯合鬥爭的路線難以相容；相反地，在透過參與、形成不同的集體或公共空間，抵抗各種形式的壓迫、實現自由與平等的過程中，個別的公民可以集結、轉化成為不同屬性的政治主體，可以是階級主體、性別主體，也可以是包含階級或其他向度，但不被階級矛盾所化約的人民群眾。凡此種種，問題的關鍵仍是在於，讓上述公民參與的政治過程得以發生的公共空間，讓「群眾」得以用「直接乃至尖銳、直接的語言與行為呈現自己的真實想法」（*ibid.*: 160）的制度性條件是否存在？而這也把我們帶回了本書念茲在茲的「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條件」如何可能的問題。

關於共和，除了上述公眾參與及其中可能蘊含的多元、開放的可能性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涉及愛國主義與對外關係的向度，但這比較是賀照田老師在另外一本書《當中國深入世界》中所要處理的問題，此處我也不多做延伸，惟希望能請賀老師針對本書中提及的「國家統合原理」這個問題多做討論。簡單地說，什麼樣的「國家統合」，可以既不須奠基於對內的高壓控制，也不構成對外的威脅？什麼樣的統合，可以不是對於追求共

同體成員自由的共和的抵銷？如果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既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同時也是人民共和國家的打造，那麼，在「革命」與「建國」之間，「社會」是被解放，抑或被統合了？兩者容或不是二擇一的關係，或孰先孰後的問題，但是，其中的張力與用以克服張力的作法，以及國家往往凌駕於社會的趨勢，顯然都需要被認真檢視。

引用書目

- 賀照田 (He Zhao-Tian)。2020。《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Geming hougeming: zhongguo jueqi de lishi, sixiang, wenhua shengsi* [Revolution/Post-revolution: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Thoughts and Culture of China's Rise]。新竹 (Hsinchu)：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Press)。
- 鈴木將久 (Suzuki, Masahisa) 主編。2016。《當中國深入世界——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Dang zhongguo shenru shijie: dongya shijiao xia de zhongguo jueqi* [When China Goes Deep into the World: "The Rise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香港 (Hong Kong)：亞際書院有限公司 (Inter-Asia School Limited)。